



# 两股相异力量促成创作繁荣

——听众分享贾平凹/陈思和专场观点

编者按：12月6日，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上海市作协副主席陈思和做客第81-4期文汇讲堂，分别主讲《品种、招魂和家园》与《法自然和现实主义创作》。讲座结束后，讲堂负责人对部分听众进行了回访。

回访时间：12月9日-11日 9人 3个小时  
回访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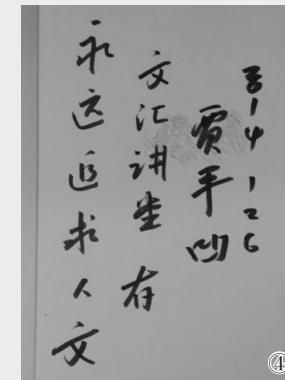
00后 郁芊芊 曹杨二中高一  
95后 付云鹏 财大中文系古典文学硕士  
90后 李鑫 上海大学数学系大三  
80后 关俊强 工程师  
75后 李佳 中专老师  
70后 张海荣 企业管理  
55后 程邵贵 思政人员  
回访设计、实施、撰文：李念

问题一：陈思和认为21世纪进入了文学创作的最佳时期，因为有一批1980年代就开始起步的作家坚持独立写作，您同意他的这种观察吗？您平时看过这批作家家里的哪些作品？

问题二：贾平凹认为，文学可以为这个有病的社会“招魂”，这只是治疗的一种，但文学开不出药方。从您的阅读体验而言，您觉得文学有这个功能吗？

我在给友人发微信时，说贾平凹/陈思和专场“人山人海”，但是，当我看到排队签名的人鱼贯而又鱼贯时，心里其实是一下“咯噔”一下的，巨大的问号一直盘亘在脑海。贾老师的方言演讲，我认真听了，大概听懂七成，因此，在整理稿件时，我特地整理出5500字的微信版，让贾平凹小说的语言再现，语言背后的思考自现，微信得到了广泛的阅读，而见报的只有3000余字，极为浓缩但不失精华，题为《文学为转型社会“招魂”》。

大家为何都愿意来听这场演讲？作为大型的学术类的公益演讲，哪个要素在吸引大家？这是我本次抽样回访的强烈冲



①与两位大师近距离的接触，让听众倍感激动

②讲座现场从“座无虚席”到“站无虚席”

③尚未开场前，慕名而来的听众队伍便早已排成长龙

④贾平凹寄语文汇讲堂：永远追求人文

动。抽样观点回访是随机的，尤其避开职业研究人员，比如在读中文系学生、教师，非常强调人群年龄分布，职业分布的广泛，回答的真实性，还有话题的公共性。前三次得到了很好的反馈，听众中善于表达、有思想的人，一个接一个，让你感觉又听了一场演讲。这一次的回访，却有一点点不顺利，我的疑问被一点点地证实，也许，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因此，要感谢回访带来的启示和某种努力方向。我也将换一种文体来表述。

对于是否出现作家创作的繁荣期，程邵贵认为，这个时代巨大的变化给作家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素材——密集的信息量，千奇百怪的人生态度，而作家的理解力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渐深刻，加之天生的

敏感性，因此，大时代出大作家，是有逻辑必然性的。

李鑫认为，这种繁荣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这些坚守的50后成熟作家群，通过一部部作品对现实进一步加强批判，另一方面，80后、90后作家以他们的理解在表达文学，尽管这两个作家群的经历不同、理念不同、思维不同、品味也相异，价值观甚至也有冲突，但是，毕竟是在一起促进文学的繁荣。两者之间也很难评判孰优孰劣，因为受众群不同。对此，00后的郁芊芊觉得自己爱文学，但是看得更多的是网络文学，对于贾平凹的乡土文学，感觉是有精神力量的传达，但是因为自己没有这种乡村体验，所以，相信有了阅历后就会去阅读“纯文学”。张海荣认为作品的生命力一方面和作家自身的成熟度有关，

另一方面，作品和读者的距离是很难确定的，作品的价值是由市场决定，而市场由读者决定，作品的好坏不是绝对的，不同人群的共鸣不一样。

李佳则认为，这个时代优秀的创作集中在个别作家身上，80、90后作家比较注重娱乐和浅显的快餐文化，对真正时代的拷问涉猎较少。而那些沿着深刻路线在表达的作家，一定也有，但是社会知晓率就很低，这对出版社和传播机构都是一个挑战。

（在受访人群中，对贾平凹多数是耳熟、眼熟，除了学生时代教材里读过一些散文外，六成以上的人没有读过任何作品，包括《废都》。被问及以后还会读贾平凹的作品吗？三成的人给予肯定回答。否

定回答的理由是太忙。有回答如果被改编成影视，可能看的冲动会更大些。）

对于文学的“招魂”功能，几乎得到所有人的认可。程邵贵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于社会“一切向钱看”给予了矫正，呼唤人们重拾理想；李鑫则将文学作为传统文化传承的生力军，经典作品给人以支撑力量。付云鹏、李佳、郁芊芊都认为，文学作品能起到让你反省人生的作用。李佳和关俊强同时以鲁迅为例，鲁迅的作品撕开了这个社会的表皮，让人看到黑暗、丑恶，但是并没有开出药方，但是，这种针砭社会时弊的力量就是“招魂”带来的震撼。而进一步的改革，是要依靠政治家、改革家，依靠法治等更多的要素来共同参与完成，文学更多是营造心灵的精神家园。

（上接第3版）

文汇讲堂：所以您曾这样描述“仔细倾听我们日常生活的感受，努力在更广阔的范围里，以更多样的角度来审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审视我们置身的现实环境。我甚至相信，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的视角、思路、概念乃至研究‘范型’，正是知识界一个重大的命题，也是中国思想界向当代人类思想——特别是对‘全球化’的普遍反省——作出贡献的途径所在。”但文化研究本身也是美国的研究范式，您在很多场合提到要避免重蹈被学院化的危险，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王晓明：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文化研究1950年代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兴起时，是为了抵制美国式的大众文化入侵欧洲。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英国社会被大众文化所主宰的话，英国社会是没有未来的。那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社会坐稳了。而英国当时拥有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想让工人阶级文化和青少年亚文化来对抗大众文化。英国文化研究在1980年代传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在美国

成了显学，又从美国这个全球的学术体制中心，以更快的速度传送到全世界，包括亚洲。但是美国的文化研究和英国传统不同，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改变社会，而仅仅满足于理论上的批判。文化研究被彻底学院化了。

所以当时在上海大学创立了中国高校第一个文化研究系时，我们的目标就很清楚，那就是我们不要美国式的文化研究，而要回到英国式的方向中去——不仅仅是批判现实，而是要介入现实，改变现实。因此，我们的文化研究网站首页上写着：改变文化就是改变世界。

## 十年摸索十年目标——“扬短避长”的学术准备

文汇讲堂：所以，我们看到了您在探索文化研究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主编刊物《热风学术》及热风丛书，创办文化研究网，建立上海高校文化研究联合课程。您的学术研究习惯带来了哪些改变？

王晓明：变化很大。我本来是做文学研究的人，我之所以会选文学，就是因为可能更关心人的内心，更习惯于书斋，喜欢独处而不是跟人打交道，生活习惯相对散漫、思绪多变、性格敏感。可要做文化研究，这些就不行了。很多事情都要从头学起，我要去努力地讲英文，认识更多的新同行；以前我写文章很推敲，不允许编辑改动，但是现在写起来很快，我甚至还习惯了被人家退稿。所以，真的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我去国外都是做学术研究，但是后来去伦敦，就会去孟加拉国移民的居住区了解住房状况。我前一段时间去罗马，就让我的朋友陪我去访问罗马郊外的农民。这些都不是我擅长的事，甚至是勉为其难的事，所以人家说我“扬短避长”，其实还真的没有说错。坦白讲，我是做得很吃力的，如果我做我原来的研究的话，那就是驾轻就熟的了，而且跟我的性格也更加契合。

文汇讲堂：在2013年出版的《巨灵魂的战栗》一书中，汇集了2013

年联合课程的部分文章，在书中，人们都一致半开玩笑地认为您就是那“巨大灵魂”，上海各大高校的师生因您在周末搭乘各种交通工具从上海的四面八方汇集到上大。这也算是文化研究的一种成果吗？换句话说，您从事文化研究已经有十年了，达到预期了吗？您的目标是什么？

王晓明：从很早的时候我就知道所谓“介入”的活动，其效果我们自己是无法估计的，也是我们无需考虑的，影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如果从学术的层面，我在两条线索上为这种“介入”寻找依据。一个方面是对当代中国支配性的文化生产机制进行分析，我特别注意从日常生活，尤其是这个生活的经济的方面切入。另一方面则是对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考察，因为这是一种根据，当我们说当下现实存在许多问题时，我们总得有一个参照系；要评价1940年代以后的状况，更不能只从西方去找标准。鲁迅和他的老师辈这两代人确实通过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形成了在我看来对今天的中国最具有参考价值的

思想资源。对于中国历史的评价，应该以这段历史所形成的思想和社会传统作为评价标准。资料性的工作我已经做了一些，接下来要写一些专题文章出来。这两个方面就是我现在的研究规划，我希望自己能够在70岁以前完成这些。

文汇讲堂：您如此“壮士断腕”般投入到“介入性”的学术研究中，现在还看文学吗？

王晓明：事实上，以我个人来说，我的家庭，我的求学经历，我的本性，始终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人，而且对于文学依然抱有别人看来可能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望，这是命中注定的。我今天当然还会去分析文学，但大概能比较冷静，努力以一种文化研究的眼光来看待它，不像以前以作家为中心来讨论作品，而是更加关注整个社会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我觉得再继续从作家个人的角度来解释文学作品已经不充分了。另一方面，我还会读小说读散文，但那是个人欣赏，不带功利的研究目的，不像以前，个人爱好和研究功利混在一起。